

旅游景区

辐射带动效应研究

——以成都市为例的实证研究

韩勇 陈进忠 贾荣 等◎著



中国旅游出版社

旅游景区

辐射带动效应研究

——以成都市为例的实证研究

韩勇 陈进忠 贾荣 等◎著



中国旅游出版社

项目策划：徐 峥
责任编辑：孙妍峰
责任印制：谢 雨
封面设计：何 杰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旅游景区辐射带动效应研究：以成都市为例的实证研究 / 韩勇等著. — 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17.7
ISBN 978-7-5032-5877-0

I . ①旅… II . ①韩… III . ①旅游区—经济发展—研究 IV . ① F59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93556 号

书 名：旅游景区辐射带动效应研究：以成都市为例的实证研究

作 者：韩勇等著

出版发行：中国旅游出版社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甲9号 邮编：100005)

<http://www.cttp.net.cn> E-mail: cttp@cmta.gov.cn

营销中心电话：010-85166503

排 版：北京旅教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2017年7月第1版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

开 本：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 张：13

字 数：308千

定 价：35.00元

I S B N 978-7-5032-5877-0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发现质量问题，请直接与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前言

我国旅游业经过 35 年的发展,已经从外事接待型的事业,发展成为全民广泛参与就业、创业的民生产业和综合性的现代产业,并极大地促进了相关产业的发展。目前很多省、区、市都将旅游业作为战略性支柱产业。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来,旅游业正在成为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新增长点。旅游业是拉动消费、投资、就业、出口的新增长点,是推动产业融合与发展、经济转型升级的新增长点;是优化区域布局,统筹城乡发展,促进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的新增长点,是促进脱贫致富,实现共同小康的新增长点。作为综合型产业,旅游业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辐射作用和带动效应日益明显,应加快旅游业的改革发展,充分发挥其辐射效应和综合带动功能。我国旅游业改革发展的新目标是:到 2020 年,从初步小康型旅游大国迈向全面小康型旅游大国;到 2050 年,我国成为初步富裕型国家,实现从全面小康型旅游大国到初步富裕型旅游强国的新跨越。这即是我国旅游业面临的新形势和新要求。^①

现阶段旅游业发展的新特点,一是我国旅游业发展已经逐步跨入大企业推动发展阶段,市场主体已经不再是小企业,大批非旅游类大型企业不断进入旅游业,旅游业产业化、集团化趋势加强;二是旅游发展进入大资本、大项目推动阶段;三是旅游业已进入产业集聚融合发展的新阶段,旅游业的综合带动功能全面凸显。而旅游业发展的新趋势是市场化、集团化、产业化、集聚化、现代化、国际化水平的不断提升,逐步实现转型升级。我国旅游业发展的新特点和新趋势,同样体现着旅游业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辐射作用和综合带动功能。

显然,我国旅游业发展的新形势和新要求、新特点和新趋势,都体现着旅游业正在成为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新增长点。其对消费、投资、出口、就业,对产业集聚融合与发展,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辐射功能和综合带动效应,这是本书研究的大背景。

一、旅游景区辐射带动效应研究的任务

国家 A 级景区是成都市旅游产业重要的组成部分,是规模最大、业态最长、关注度最高、影响力最广的旅游综合体。成都市国家 A 级旅游景区的发展关系到成都市旅游业的改革发展,关系到建设世界旅游目的地城市的前景。因此。对成都市国家 A 级旅游景区辐射带动效应的研究,有利于了解景区开发和经营管理现状;有利于分析景区辐射带

^① 李金早.我国旅游业发展的新形势和新要求 [R].2015 年全国旅游工作会议工作报告.

动的行业、产业发展效应，以及区域经济发展效应和圈层效应。

在综合评估的基础上，分析成都市国家 A 级旅游景区辐射带动效应的类型，以及辐射带动效应因素及具体指标，提出相应的发展模式及对策建议，强调成都市国家 A 级旅游景区在旅游业发展的新形势和新要求，新特点和新趋势的大环境下，坚持走内涵发展，精细化管理道路，着力培育新的增长点，进一步发挥在消费、投资、就业、产业融合与区域经济发展等方面的辐射和综合带动功能。同时，提高景区自身的市场化、集团化、产业化、集聚化、现代化和国际化水平，加快实现景区提质增效和转型升级，为成都市旅游业改革发展和地方经济建设以及世界旅游目的地城市建设做出新的贡献。

二、旅游景区辐射带动效应研究的意义

大多数 A 级旅游景区一般仅有营业总收入结构的统计和分析，如门票、住宿、餐饮、娱乐文化活动、大型表演等收入比例的统计，缺乏景区对第一、第二、第三圈层区域经济发展辐射带动效应的统计和分析。地方政府和旅游行政部门对旅游业年度统计数据大多包括接待国内外游客数、旅游业总收入、旅游业增加值及其占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旅游业对本地区 GDP 的直接贡献率、旅游业对相关产业的带动作用等，而对景区的圈层辐射带动效应，景区对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如旅游住宿业、旅游餐饮业、旅游房地产业、旅游交通、旅游基础设施、旅游扶贫、旅游文化产业、旅游综合体、乡村旅游业、生态农业、工业商贸、信息通讯业、金融业、电子商务、物流业、科技服务以及就业等方面的辐射带动效应与功能基本没有统计和分析，这不仅反映出景区自身的产业体系不够完善，而且反映出围绕景区的城市、乡镇、旅游目的地的旅游产业集群尚未形成。因此，关于旅游景区辐射带动效应的研究对旅游景区以及旅游景区辐射带动的旅游区域经济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课题是由韩勇主持的成都市旅游局重点研究项目，项目结题后，由韩勇策划，组织专家学者编写成书。参加撰写工作的有韩勇、陈进忠、赵萍、陈颖、张思寻、王毓梅、杨曦、王海、罗正琴、贾荣、肖紫菱、张辉辉、闫海莹、海笑、魏佳、孙传宝、黄旭、胡蝶等，最后由韩勇、陈进忠、贾荣统稿。本书的出版得到了中国旅游出版社段向民和徐峥老师的精心指导和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韩 勇

2017年5月

目 录

第一章	国外旅游景区辐射带动效应研究的经验和问题	1
第一节	国外旅游景区辐射带动效应研究历程	1
第二节	国外旅游景区辐射带动效应研究述评	3
第二章	国内旅游景区辐射带动效应研究的现状和启示	5
第一节	国内旅游景区辐射带动效应研究现状	5
第二节	国内旅游景区辐射带动效应研究述评	7
第三章	成都市旅游景区发展现状分析	9
第一节	成都市国家 A 级旅游景区基本情况	9
第二节	成都市国家 A 级旅游景区发展的主要问题及对策	12
第四章	成都市国家 A 级旅游景区辐射带动效应分析及评价指标体系	14
第一节	成都市旅游景区辐射带动效应类型分析	14
第二节	成都市国家 A 级旅游景区辐射带动效应评价指标体系	18
第三节	成都市国家 A 级旅游景区区域辐射带动效应示意图	20
第五章	世界遗产类旅游景区辐射带动效应实证研究： 青城山—都江堰国家 5A 级景区	30
第一节	青城山—都江堰旅游景区对社会产业的辐射带动效应	30
第二节	青城山—都江堰景区对区域旅游业的辐射带动效应	42
第六章	乡村旅游类景区辐射带动效应实证研究： 郫都区农科村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	50
第一节	农科村旅游景区对社会产业的带动效应	50
第二节	农科村旅游景区对区域旅游业发展的带动作用	58

第三节 农科村景区的三圈层辐射带动效应	63
---------------------------	----

第七章 历史文化类旅游景区辐射带动效应实证研究:

双流区黄龙溪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	65
第一节 黄龙溪旅游景区对社会产业的带动效应	65
第二节 黄龙溪旅游景区对区域旅游业发展的带动效应	73
第三节 黄龙溪景区三圈层带动效应	80

第八章 自然景观类旅游景区辐射带动效应实证研究:

成都市西岭雪山风景旅游区	81
第一节 西岭雪山风景旅游区对社会产业的带动效应	81
第二节 西岭雪山风景旅游区对区域旅游业发展的带动效应	92
第三节 西岭雪山风景旅游区三圈层带动效应	97

第九章 历史文化名镇类旅游景区辐射带动效应实证研究:

成都市崇州市街子古镇	103
第一节 街子古镇景区对社会产业的带动效应	103
第二节 街子古镇景区对区域旅游业发展的带动效应	111
第三节 街子古镇景区的三圈层辐射带动效应	118

第十章 博物馆类旅游景区辐射带动效应证实研究:

成都市武侯祠博物馆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	120
第一节 成都市武侯祠博物馆对社会产业的带动效应	120
第二节 成都市武侯祠博物馆对区域旅游业发展的带动效应	133
第三节 成都市武侯祠博物馆三圈层带动效应	137

第十一章 主题游乐类旅游景区辐射带动效应实证研究:

成都市国色天乡乐园	139
第一节 成都国色天乡乐园对社会产业的带动效应	139
第二节 成都国色天乡乐园区域旅游业发展的带动效应	148
第三节 成都国色天乡景区的三圈层带动效应	154

第十二章 工业旅游类旅游景区辐射带动效应实证研究:

中国·川菜体验园景区	156
第一节 中国·川菜体验园景区对社会的带动效应	156
第二节 中国·川菜体验园对区域旅游业发展的带动效应	165
第三节 中国·川菜体验园景区三圈层带动效应	168

第十三章 研学带动型旅游景区辐射带动效应实证研究:	
成都市龙泉国际标榜旅游区	171
第一节 国际标榜旅游区对社会产业的辐射带动效应	171
第二节 景区对区域旅游业的带动效应	180
第十四章 商贸类旅游景区辐射带动效应实证研究:	
成都海宁城商贸旅游景区	183
第一节 海宁城商贸旅游景区的发展背景及建设路径	183
第二节 成都海宁城商贸旅游景区对社会产业的带动效应	189
第三节 海宁城商贸旅游景区对区域旅游业的带动效应	194
第四节 海宁皮革商贸城旅游景区三圈层带动效应	195
参考文献	197

第一章

国外旅游景区辐射带动效应研究的经验和问题

第一节 国外旅游景区辐射带动效应研究历程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旅游影响的研究在欧洲和北美地区兴起，并从 20 世纪 60 年代起成为旅游研究中一个范围广阔且意味深远的重要研究领域。60—70 年代有关旅游景区辐射带动效应的研究文献主要集中在积极正面的经济影响评述，同时也有部分学者开始关注旅游开发于目的地的社会文化等方面的负面影响。

国外学者通过计量模式对旅游的空间辐射及扩散效应进行了研究，Crampon（1966 年）首次提出了基于旅游研究的引力模型，并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旅游发展在带来经济效应的同时可能会导致目的地交通阻塞、商店或其他场所人员拥挤、犯罪率提高，从而对旅游目的地社会产生社会文化及生态环境等方面的负面影响。Pizam（1978 年）通过对马萨诸塞开普角的 1636 位居民和 212 个企业家的调研，研究了旅游对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以及居民对旅游业的负面感知，研究显示当居民感知旅游发展导致犯罪率升高等负面影响时，他们对在本地开发旅游项目的愿望会因此减弱。Rothman（1978 年）对海滩度假旅游区进行了研究，指出旅游业几乎对当地社区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居民的行为模式。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国外旅游影响的研究中出现了均衡的观点和系统的方法，主要表现在不同旅游目的地横向的对比分析，以及对量化方法的探讨，环境影响和可持续发展理念开始广泛出现。Mathieson 和 Wall（1982）在《旅游：经济、环境和社会影响》一书中全面系统地对旅游影响理论进行了论述，并将旅游过程划分为动态因素、静态因素和因果因素，在此基础上构建了旅游影响（经济、社会和环境 3 个维度）的概念性框架，成为现有旅游影响研究的基本框架，他们指出旅游业发展所带来的经济影响总的来说是有益的，社会影响不太受欢迎，而环境影响则是“双刃”的。根据他们的研究，旅游经济效应的发挥受各国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结构、旅游设施和旅游吸引物的类

型、地区对旅游收入的吸纳和再利用程度等因素的影响。Sandro Formica (1996) 在对意大利进行案例研究时发现由于意大利南部经济发展较为落后, 即使拥有很多著名景区, 但仍然仅有 10% 的国际游客和 17.9% 的过夜游客选择南部作为旅游目的地, 说明目的地经济发展水平对于标志景区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旅游现象的综合性以及形态的错综复杂, 使得旅游景区的开发及旅游接待活动的影响深入目的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进而造成社会心理素质变化、社会开放及现代化、社会变迁及社会结构变化以及社会伦理改变等, 发展旅游业所带来的社会文化影响由此成为众多学者关注的重点。Frater (1983) 指出乡村旅游区的开发有利于扩大农业的经营范围与服务领域, 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 有利于农业由第一产业向第三产业扩展, 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 成为农村就业的有益补充并显著增加农民收入。Sheldon 和 Var (1984) 的研究认为文化差异是导致旅游引发的社会文化影响的重要因素, 长期居民对旅游导致的社会文化影响更为敏感。Juanita (1987) 研究了夏威夷、北威尔士和伊斯坦布尔这三个处于不同地理位置、不同的旅游业成熟阶段的旅游目的地, 指出旅游环境影响是由所有旅游目的地社区居民共同承担的, 并且越是旅游业发展成熟的目的地, 居民对于旅游带来的环境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的感知越强。Milman 和 Pizam (1988) 从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两个角度研究了佛罗里达地区中部的旅游影响, 指出正面影响多与经济目标相关, 如就业机会、生活水平及收入、城镇税收以及生活质量, 而负面影响则主要表现在交通、个人犯罪、组织犯罪、吸毒、酗酒等社会方面。Kariel (1989) 通过对奥地利阿尔卑斯四个社区的调研, 发现多数居民对旅游影响给以积极的评价, 同时旅游发展带来的社会负面影响也受到关注, 其中旅游增长速度和强度是导致居民对旅游态度的重要因素。旅游业发展也可能影响目的地居民之间的社会关系。如 Ross (1992) 通过对澳大利亚凯恩斯居民的调查研究, 发现旅游发展削弱了当地居民间的友谊, 本地出生的或居住时间较长的居民可能更为珍视这种社会关系, 并因旅游扰乱了这些关系而对其持反对态度。

进入 90 年代, 国外学者关于旅游影响的发展阶段理论、社会交换理论等日渐成熟。在旅游影响衡量指标方面, Lankford 和 Howard (1994) 构建了一套由 28 个变量因子组成衡量旅游影响的态度尺度。首先通过大量的文献综述和专家评价法, 分类归纳概括了衡量旅游影响及居民态度的变量以及指标; 然后以变量与指标为基础设计调查问卷, 对衡量尺度指标在案例研究中的应用情况进行预试, 并根据问卷调查的结果运用定量分析的方法对衡量尺度的变量与指标进行净化和完善; 最后再一次以问卷的形式将第二轮遴选的变量与指标投放到实际的案例研究中, 获得衡量尺度的实证。Ap 和 Crompton (1998) 认为 Lankford 和 Howard 量表中的指标与实地调查关联性不强, 他们以爱琴海东部的希腊萨摩斯岛为例建立了模型, 提出了一套包含 7 个因子大类的由 35 个变量指标组成的旅游影响尺度, 这篇题为《建立和测试旅游影响尺度》的论文, 因全面系统的文献综述、恰当的研究方法, 以及推导步骤的严密、尺度净化与实证过程的精确与仔细, 加之信度与效度测试的可信度, 因而获得了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1998 年度的最佳论文奖。

在旅游的就业效应方面, Wilkinson 和 Pratiwi (1995 年) 研究了印度尼西亚爪哇岛, RWalpole 和 Goodwin (2000) 调查了印度尼西亚 Komodo 国家公园, 发现旅游业对旅游

地居民的影响并不均衡,非原居民由于拥有资本或掌握了相关专业技能,往往从旅游业中获得的经济利益要比原居民多。Kon (1998) 通过对泰国 Samui 岛饭店住宿业的研究,指出饭店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为当地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但其中不需技能的低薪水的工作岗位占绝大多数,而管理职位和专业技术职位却很少。Campbell (1999) 对于哥斯达黎加奥斯辛诺发展乡村旅游的研究显示,虽然多数当地居民对旅游持支持态度,但是他们却由于缺乏意识未能充分把握旅游所提供的就业或投资机会,加之外地投资者的不断涌入,在缺乏有效规划或干预的情况下,目的地居民进一步从旅游获益的机会将因此受到限制。Griefec (1999) 认为目的地居民能在观光性农业旅游区的发展过程中获得相应利益,并积极为农业旅游发展做出一定的贡献。Holland (2003) 认为由于乡村旅游具有产品规模小、多数是农业产品等特性,可以吸收更多的农民参与到旅游中来,增加了农民的就业机会。Frechtling 和 Tchetchik (2005) 研究认为农业旅游不仅不会改变传统的农业经营方式,还能增加农业产品和旅游服务的附加值,从而高了农业产业的远期价值。Cichowska (2011) 研究了波兰滨海地区的农业旅游项目,指出应加强当地农民从非农收入来源获得利益的意识,从而发挥乘数效应,通过增加为游客服务的工作岗位来减少失业率,不但增加了农民收入,而且提高了农民的价值观,进而带动加工业和传统手工业等下游产业的发展。Mthembu (2011) 通过对伯格维尔的乡村旅游发展进行调查,发现绝大多数受访者认为乡村旅游对农民增收非常重要,乡村旅游逐步成为当地农村最重要的经济增长因素之一,可以为当地的村民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提高创业技能,从而显著提高当地农民收入水平。

在旅游开发的环境影响方面,Borg (1996) 对欧洲 7 个世界遗产所在地城市进行了调查,研究表明旅游业的发展已经威胁到当地遗产的完整性。Huybers 和 Jeff (2002) 研究了澳大利亚北昆士兰地区旅游目的地竞争力和环境管理的关系,发现其环境质量与英国游客的需求量成正比关系,同时对该地旅游业的利润水平也有着重要影响。Tarling 和 Huybers (2003) 系统研究了旅游与环境之间的关系,Buckley 和 weavern (2003) 详细论述了旅游与社会文化及环境之间的关系,并提出旅游开发中环境管理的措施。Fotsch (2004) 对美国加州 Cannery row 景区的研究证实了旅游开发中极易出现的文化商品化、标准化,以及对历史文化的歪曲、旅游体验降低等问题。Joseph (2003, 2005) 通过对波斯瓦那龙头景区 The okavango Delta 研究,指出景区吸引了大量的国际游客,对于当地的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大量的旅游企业来自于外部投资尤其是国外投资,龙头景区对当地的带动作用仅仅局限于微薄的工资和少量的消费,大量旅游收入又流出了目的地,不但如此,噪声、垃圾等污染却成为目的地区域所承受的外部成本。

第二节 国外旅游景区辐射带动效应研究述评

旅游影响研究、旅游开发研究是国外旅游研究中占主流地位的领域,总的来说,国外学界在经过 50 多年的发展之后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并表现出显著的多学科、跨学科共同参与的特点。目前关于旅游影响的研究正在由单个案例的分析转向旅游目

的地一体化的研究领域，学者们的研究不再停留在表面现象的描述，而是由单一的旅游景区辐射带动深入到旅游目的地内在的辐射集聚机制中，研究的理论深度有逐步加深的趋势。

自世界旅游组织（WTO）在 1993 年提出了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以来，应用该相关理论对旅游景区辐射带动影响的实证研究范围日趋扩大，如合作关系、气候变化、农村土地利用、影响和政策应对、承载力和可持续能力等，研究视角的多元化也反映出旅游景区辐射带动效应研究领域的多学科特征。近些年数据建模和一些先进的分析方法运用在逐渐增多，诸如多维度建模方法、地理信息系统和计算机仿真等。

由于发达国家进行旅游景区开发、发展旅游业是为了满足大众日常休闲的需求，对于旅游景区开发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并不过度关注，学者们研究的内容也较多集中于非经济效应或负面经济效应上。研究主要停留在对一些社会现象的解释层面，而缺乏对于旅游景区辐射带动模式以及系统动态运行等深层次的关注。旅游景区所产生社会文化影响因其形成原因复杂、涉及领域广泛，受到学者们更多的关注。部分学者从社会学、人类学的角度出发研究旅游活动（旅游项目）对于目的地的社会文化、生态环境影响，是在主观意识的基础上对旅游目的地的一种认识，目前还未取得新的理论突破，是这一领域研究的难点。

第二章

国内旅游景区辐射带动效应研究的现状和启示

第一节 国内旅游景区辐射带动效应研究现状

随着旅游业的迅猛发展，旅游景区的规模也逐渐扩大，旅游给当地带来的社会影响、经济影响、环境影响和文化影响也日益明显。如殷红梅等（1997）以龙宫为例揭示喀斯特民族旅游区旅游效应及其空间辐射的基本特征；魏学峰（2007）研究了大型活动非举办地如何开发其旅游辐射效应；王利鑫等（2011）引入旅游辐射场强模型、旅游断裂点、旅游集中系数进行量化分析了上海世博会对周边城市旅游辐射效应。

一、经济效应方面

熊绍华等（1995）以武陵源为实例分析了旅游业对区域经济的影响。刘赵平（1998）介绍了社会交换理论在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研究中的应用，通过对野三坡的调查研究，发现凡是对旅游持肯定态度的村民多数是从旅游开发中得到经济收益者，他们对旅游产生的负面影响一般持宽容的态度。操建华（2002）将旅游收入在城乡及城乡居民之间的分配问题作为切入点，从微观和宏观两个角度较为系统地研究了旅游业对农村发展、农民增收及就业的影响，研究指出农村旅游业的主要受益者是农民，农民能否获得就业机会与劳动力素质相关。肖洪根（2002）总结了旅游开发对目的地的经济影响包括：赚取外汇、平衡收支；带动地方经济、增加税收；提供就业机会；增加居民收入、提高生活水平；增加基础设施投入（如交通、公共设施等）；改善经济结构、增加企业投资；增加购物机会和场所。陈亮（2003）分析了国内4A级旅游景区的空间分布特征，发现我国4A级旅游景区在数量上和密度上都呈现出“东强西弱”的空间格局，由此进一步分析确定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是决定4A级景区（点）分布的重要因素。杨新军、马晓龙等（2004）研究了西安市主要旅游景点（3A级以上）的空间分布，发现高级别旅游景区是区域旅游业发展的依赖性资源，很大程度上决定旅游主体空间流向和目标市场的选

择,由此得出高级别景区是对旅游目的地区域发展影响较大的两个要素之一,决定着目的地旅游产业的规模、空间分布和旅游流向的观点,明确提出将高级别旅游景区作为旅游产业增长极,以充分发挥高级别旅游景区的关联作用。

在旅游景区与周边社区的关系方面,李慧欣(2003)从经济学供需层面分析了乡村旅游的作用,指出乡村旅游能够促进当地农产品销售,增加农民收入,同时有利于优化产业结构和农业产业化发展。马晓龙等(2004)指出高级别旅游景区在拉动旅游产业发展和提升就业率等方面作用显著。贾浩华等(2005)研究发现井冈山景区通过开发“红色”旅游产品使景区内的经济结构得到调整,同时也改变了农民谋生手段,增加了老区农民收入,为解决老区“三农”问题找到了一条行之有效的道路。陈志钢等(2006)通过对山东日照王家皂村的研究,指出乡村旅游的发展使得当地村民的收入迅速增加,村民的就业结构发生了变化,农村劳动力向单部门经济转移。孔祥智等(2008)对山西省后沟古村、乔家大院、晋祠三个景区进行了研究,发现乡村旅游改变了农村产业结构,缓解了景区人地关系紧张的矛盾,使农户的生计资本得以积累和增加,特别是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得到较大提升。魏云刚(2009)认为景点型旅游城市必须调整发展思路,加强城市旅游发展,旅游发展的重心尽快由过去的旅游资源开发和景区点建设,转向旅游目的地一体化建设。叶传忠(2010)对福建省武夷山市一个村庄进行了研究,该村庄没有直接参与到当地的旅游业中来,也并未发展旅游业,农民也没有与游客直接接触,但旅游业的巨大辐射带动效应,不仅调整了该村庄的生产结构,而且有效拓宽了农民增收渠道。王建喜(2010)通过对江心洲农业旅游景区的调查分析,发现旅游开发大大拓宽了农民就业渠道,农民收入增加,其中96%为直接或间接从事旅游业的收入。崔丽娟(2012)分析了亚布力滑雪场运营前后对附近村民的影响,认为亚布力滑雪场给当地农民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但由于农民素质、资金等原因,只是使部分农民收入改善,并没有达到全民收入的增加,同时由于滑雪场季节性的原因,农民收入存在较大的季节性波动。

旅游景区或多或少影响着所关联旅游城市各行业、各领域的发展,促成了以旅游业为龙头的旅游经济产业链的形成。在使用旅游收入和国民收入面板数据的量化分析方面,江民锦(2007)运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分析指出井冈山市农户收入与风景区的距离、从事旅游业的收入、人均农业经营收入呈正相关关系,并运用专家调查法对井冈山市农民获得的旅游收入份额进行了测算。唐代剑等(2009)运用浙江省景区边缘、特色产业和民俗文化三种不同类型乡村旅游点的数据,运用回归分析方法研究,指出乡村旅游的发展促进农民收入增长12.17%,农村就业率提高13.26%,有利于新农村建设和城乡一体化进程的推进。吴妍等(2009)利用SPSS统计软件分析成都红砂村旅游发展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得出影响农民收入的主要因素是农民的受教育程度及与景区的距离,且这两个因素与农民收入之间呈线性关系。于洁(2013)以河北白洋淀景区为例进行分析,指出旅游业发展促进了当地农村经济的发展,提高了农民收入,但由于参与程度不同,导致景区周边农民收入不均衡,一些农民并没有从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中获得长期利益。刘亚军等(2013)通过对新疆吐鲁番葡萄沟景区农民收入分析,发现景区的发展显著增加了当地农牧民的收入,同时也为周边的农牧民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和物质

保证,促进了农牧区农业经济结构调整。

二、非经济效益方面

随着旅游业的迅猛发展,旅游景区的规模也逐渐扩大,旅游给旅游当地带来的社会影响、经济影响、环境影响和文化影响也日益明显。20世纪90年代以来,开始关注旅游的发展对目的地社会文化影响研究的学者日渐增多。学者们在对国内旅游的发展对目的地的社会文化影响进行案例研究的同时,也不断地介绍对国外旅游产生的社会影响的研究成果。

目前国内学者对目的地的居民产生的社会文化影响的研究成果较多,在文化结构、新文化重建、社会交换理论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申葆嘉(1992)研究了旅游接待地的社会压力问题及解决对策。郑向敏(1996)较为全面地分析了旅游对民俗风情和民俗传统的影响;保继刚和楚义芳在其合著的《旅游地理学》中专门论述了旅游带来的社会影响和文化影响,对旅游给旅游目的地社会带来的价值观、个人行为、家庭关系、生活方式、道德观念、宗教、语言、健康等方面的变化做了探讨。王雪华(1999)从旅游的文化交流特性来研究旅游影响的社会文化机理,并从积极影响、消极影响以及影响的范围、程度等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具体分析。选取某一旅游景区进行社会文化影响方面研究的有:刘振礼(1992)选取河北野三坡景区为研究对象,全华(1994)以武陵源风景区为研究对象,王幼臣等(1996)以张家界森林公园为研究对象,陆林(1996)以皖南旅游区为研究对象,张文(2003)以阳朔旅游区为例,刘燕(2005)以丽江古城为研究案例,肖光明(2007)以德庆县金林水乡古村落为研究案例。

旅游景区具有历史艺术科学文化价值,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具有较强吸引力,必然会带动周边环境各种环境资源,如土地价值的升值,从而吸引各利益相关者围绕景区进行开发。肖洪根(2002)从艺术商品化的角度论述了旅游对目的地带来的文化影响,并总结了生态环境方面的积极影响包括保护自然环境(如绿化、植被、原始森林等)、维护生态系统平衡、保护古建筑与文物史迹、提升地方形象,而负面影响则有交通堵塞、客流拥挤、空气与水污染增加、噪声与果皮纸屑污染增加、破坏野生动物生存栖息环境等。同时,旅游开发对于社会文化的积极影响有提高生活质量、增加休闲娱乐设施与机会、提高防护能力(如防火、防盗、防暴等)促进文化交流、增进民族感情、了解保存文化个性、学习与陌生人(如游客)打交道、增加文化史迹的展示,负面影响有加剧卖淫和娼妓现象、加剧赌博和酗酒现象、加剧走私和贩毒现象、破坏纯朴民风、加剧人际关系的紧张、带来文化、艺术、民俗等的商品化、带来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的蜕变。徐松岭(2003年)认为当前中国具有旅游价值的遗产尤其是大型遗产的商业化经营已成为普遍趋势,由此产生的对景区及周边环境资源的破坏是普遍存在的。

第二节 国内旅游景区辐射带动效应研究述评

自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学者开始涉及包括旅游景区在内的旅游目的地的旅游影响研究,当时研究重点主要是对国外相关旅游影响的理论和研究方法的介绍、梳理、评

析。随着研究的深入,国内学者也逐渐将研究聚焦在对实地案例的调查研究上来,并在实际案例研究中开始引入定量分析方法。

通过对国内外相关研究的梳理分析,可以发现国内外学者对于旅游景区辐射带动效应的研究既存在相同之处,也体现出相互的差异。国内外学者在旅游景区辐射带动效应方面基本达成共识,认为旅游景区对于目的地的辐射带动作用十分显著,其中经济效应占据了核心地位,但也同时存在社会效应和环境效应的负面影响。国外学者在分析旅游景区的经济辐射带动效应之余,更多地将目光集中在旅游景区发展所导致的社会文化、生态环境效应之上。国内学者的研究则高度集中于旅游景区经济辐射效应领域,并由此进一步延伸到区域旅游竞合、地方旅游发展战略方面。出现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于旅游发展的不同认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世界大众旅游的蓬勃兴起,旅游被普遍看作是一种恢复和发展经济的手段,而这种情况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更是如此。相比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更为看重旅游业发展的经济目标,因此对旅游景区的经济效应更为关注。

我国旅游景区经过近 20 年的发展,以其特有的旅游特色和价值吸引旅游者前来,通过提供相应的旅游设施和服务,满足其观光游览、休闲娱乐、度假康体、科考探险、教育和特殊旅游需求。从全国范围来看,目前旅游景区数量约为 15000~20000 家(县级以上)。旅游景区极大地促进了地域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推动了当地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提升了区域认知形象和知名度。但是,一些旅游景区在发展过程中,过分依赖招商引资的外来资本和外来管理者,忽视景区所在地居民的经济文化诉求和利益诉求,造成景区经营管理活动与当地社区居民之间的矛盾,旅游景区各种负面效应逐渐凸现,使其应当发挥的辐射带动效应受到影响。在此背景下,学界在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以“社区旅游”、“可持续发展旅游”等发展理念尝试研究旅游景区发展模式、利益相关群体、可持续评价等,希望解决旅游景区与所在社区相割裂、隔离的“经济孤岛”“社会孤岛”“文化孤岛”和“生态景观孤岛”等问题,出现大量有关旅游景区辐射带动所在社区发展的研究成果。

国内专家学者对旅游影响的研究,与国外的研究相比远远滞后。由于旅游影响研究从起步之初,就是一种问题暴露后不得已才进行的检讨式、探因式的后补性研究,而并非是建构在对旅游业发展的高屋建瓴式的前瞻性的防范研究上,因此,国内的有关旅游影响的研究一直滞后于旅游学研究的其他领域。研究方法上多数内容偏重理论分析,实证研究还比较少,相信随着大量实际案例的积累,国内旅游景区辐射带动效应研究的理论性和层次性都将会有新的提升。从目前的研究内容来看,相关的研究大多表现为对单一因素的关注和分析,比较分散,缺乏系统性,说明现阶段对于旅游景区辐射带动效应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没有出现系统性的理论总结,而这正是本文所期望实现的研究目标。

第三章

成都市旅游景区发展现状分析

第一节 成都市国家A级旅游景区基本情况

一、成都市国家A级旅游景区的类型与结构分析

截至2016年年底，成都市现有国家A级旅游景区88个，其中5A级景区1个，占景区总数的1.14%；4A级景区39个，占44.31%；3A级景区31个，占35.23%；2A级景区16个，占18.18%；1A级景区1个，占1.14%（见图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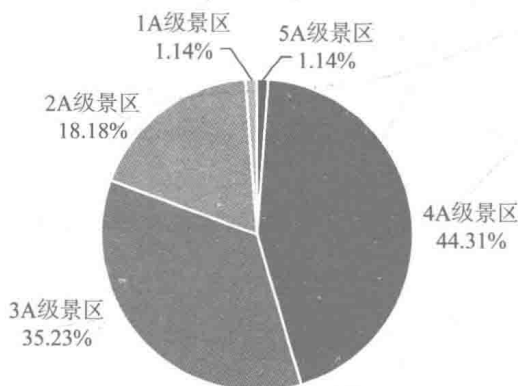


图 3-1 成都市 A 级景区结构

成都市国家A级景区中，世界遗产类1个，占景区总数的1.14%；乡村旅游类19个，占21.59%；历史文化类（包括历史文化名镇）17个，占19.32%；自然景观类11个，占12.50%；度假休闲类11个，占12.50%；工业商贸旅游类7个，占7.95%；主题游乐（文化、艺术园）类10个，占11.36%；科技教育类4个，占4.55%；红色旅游类1个，占1.14%；博物馆类7个，占7.95%（见图3-2，图3-3）。